

November 2017

Our Modernity: The Cross-cultural Potential of Chinese Scholarship

Yiqing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u, Yiqing. 2017. "Our Modernity: The Cross-cultural Potential of Chinese Scholarship."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6): pp.26-3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6/1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我们的现代性：汉语学术的跨文化潜力

刘毅青

摘要：“西方如何理解中国”与“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全球化的学术市场里互为镜像，中国对自身理解与西方处于同样的困境。这是由于，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的基本面向由现代性所塑造，全球化下的中国与西方一样面临着现代性的挑战，从而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共同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动植入的，呈现出杂糅性，传统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成了一个“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间距”。深刻地认识现代性在中国造成的断裂，是为了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重新吸收传统的价值。而若从积极的角度看，现代中国这种间于古今中西的特质所造就的汉语学术思想的内在张力，孕育着一种思想的跨文化潜力，从而汉语学术能够从古今中西的多种思想中汲取资源，完成自身的建构。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 他者； 跨文化； 汉语学术

作者简介：刘毅青，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文艺理论、比较诗学研究。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999号南昌大学人文学院，邮政编码：330031。电子邮箱：hero5308@163.com 本文系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基地项目“王阳明修身美学的当代重构[项目编号：2016YWHJD0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ur Modernity: The Cross-cultural Potential of Chinese Scholarship

Abstract: The issues of “how the west understands China” and “how China understands China” have b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n the global scholarship.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are trapped by the same issue of understanding China, because modern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basic aspects of mentality are shaped by modernity, and China and the west are equally confronted by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modernity came into being due to the western impact, and consequently Chinese tradition has become the Oth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 keen awareness of the fracture in China caused by modernity is helpful for us to reappraise the value of tradition with a more pragmatic attitude. Seen positively, the inner tension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caus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hina and the West, would breed cross-cultural potential to promote Chinese scholarship to complete self-construction through drawing on multifarious thoughts.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ty; the Other; the cross-cultural; Chinese scholarship

Author: Liu Yiqing,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with main interests in Chinese aesthetics,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Address: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o. 999 University Avenue, Honggu District, Nanchang, Jiangxi Province, 330031, China. Email: hero5308@163.com

—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误解的重要性：重新思

考中西相遇》一文中从跨文化观点重新发明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为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进行辩护。对顾彬来说，以西方视野对中国的解读本身虽然存在着某种文化历险，但根本上，“西方如何理解

中国”与“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全球化学术里已经成为硬币的两面,中国对自身理解与西方处于同样的困境。对西方汉学建构出来中国的质疑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自身。顾彬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现代以来对自身传统的误解,误解的根由在现代性的断裂,中国处于自身理解的矛盾与冲突之中,无法成为一个自我理解的主体,无法为自身传统的解释提供依据。顾彬提醒中国人:“我们得牢记在心的是,自王国维以来,大陆就开始以西方眼光来解释它自己”(“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7)。

奥登在论及英国人与他们视为传统的希腊文化时,曾说从小就必须到寄宿学校,经过各种痛苦的以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化为中心的古典教育之后,“对任何一个这样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希腊罗马跟他对儿童时代和课堂的记忆太多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他很难客观地看待这些文明”(239)。对经过了激烈的反传统之后的中国人来说,现代以来更少有可能客观认识自身传统的。“传统”与“现代”价值的分裂引发了无可调和的论战,20世纪20年代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的论争就是这种价值立场分化的典型思想事件。传统文化的解释,在五四及其后的现代中国再难以获得统一的意义,现代视野里传统的分裂镜像映照着解释者自身的立场与态度。现代性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撕裂了传统,将中国卷入现代的进程,使得古今中国人在精神品质上形同异类。对现代性的研究,迄今为止,中西学者所积累的成果汗牛充栋,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外乎从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这四个层面进行规定。鉴于现代性经过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那么对现代性的研究就必须避免以西方的现代性发展作为单一的对象,而应采取一种比较的视野,否则就不能对现代性做出符合实际的界定。而从比较的视野来看,即使从西方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发展来说,一方面存在着社会形态、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等的转型,另一方面将现代性与传统区别开来的转变在于思想意识,即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指出的,现代性思想从根本上可以看作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所谓工具理性,不单是说它是人实现某种目的而采用方法(工具)的理性化,而是因为它预设了终极关怀与理性呈二元分裂状态。

对中国现代以来西方的挑战,在思考中国如何吸收与转化西方文明的时候,许多学者希望诉

之于历史的经验。比如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史的研究,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这一时期佛教入华产生的影响,研究中国是如何吸收与消化佛教思想的,希望藉此思考中国现代如何消化和吸收西方文明。但事实上,现代性与佛教入华有着巨大的不同:

首先,现代性是伴随西方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现代以来屈辱的历史使得中国在与西方的交流中伴随着焦虑,不能以一种平等的立场与态度和西方进行对话,而中国对佛教的接受基本上是主动的,并未伴随着战争的压力。

其次,西方现代性对中国的侵入不但使得文明破碎,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更为剧烈的变革来自社会制度,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器物变革、社会革命,西方的现代性刺激传统农业文明主导下的吏治帝国在战争的进程中建立其欠缺已久的现代社会组织与结构。陈寅恪在分析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文化意义时指出,王国维表面殉清,实为中国传统之“三纲六纪”之瓦解而悲鸣,他在王国维的挽词序中云:“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掎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1)。而佛教传入中国并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引起社会变革,相反它为当时陷于精神困顿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超越的信仰,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满足了中国人对终极信仰的追寻。与之相反,现代性恰恰在解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同时,消解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现代性的这种解构性力量,瓦解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想象,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价值信仰,导致了深层的精神危机。中国在被迫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民族存亡的生存意识使得其表现出比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更为强烈的对西方物质力量的迷信,对西方精神的崇拜。

指出这种不同的目的旨在说明,中国对佛理的吸收与转化是在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未被破坏的情况下主动拿来的结果,而西方思想与理论是在中国原有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被彻底颠覆的情况下进入中国,它代表了强势的权力话语体系,以普世价值的形式占据着文化思想的高地。尤其是现代性思想对西方自身来说也构成一种裂变,西方思想界一直思考由此而形成的古今之争。因为现代性所成就的人类的思想文化与

社会组织从根本上打破了人类之前的固有传统。这一切都与佛教之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也就使得现代性思想有着比佛教更为深刻复杂的内涵,它对中国学术思想所产生的内在张力远比佛教深远。因此,思考中国现代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消化与吸收不同于佛教入华,中国现代学术是要在面临中国文化信仰崩溃的价值真空下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方式建构思想体系,它必须面对中国社会形态上所发生的转型与裂变。现代性进程中生活世界的改变,使得思想世界失去了其所依托的现实资源,西方现代性在形塑中国社会的同时,必然对传统的学术思想构成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学术从而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学术思想的范式,这种巨变远非佛教入华所能比拟。

二

中国现代的学术始于重新建构学术思想的冲动,其首要就是重估传统,朱自清说:“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再说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所用的评价标准,起初虽然是普遍的——其实是借用西方的——后来就渐渐参用本国的传统的”(朱自清32)。现代学术所依赖的标准,其普遍性的预设是以西方为参照,朱自清这里指出,西方作为普遍标准并不能代替中国自身传统,中国学术最终应该有自身的脉络,但问题就在于中国现代学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由于现代性意识的日益增强,传统观念逐渐在这种西方理论思想的渗透下发生了变形。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例,在中国文学史成为现代的学科之后,作为文学研究的文学正如浦江清所指出的:文学上的名词的意义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文学的演化或发展而改变。现代中国文学在欧化的过程中,新旧共同的名词,老的意义渐渐被人遗忘,而新的定义逐渐成为定论。“所谓新的定义实际上是从西洋文学里采取得来的,一般人既习惯于这种观念,于是对于原有的文学反而有隔膜不明的地方,回头一看,好像古人都是头脑糊涂观念不清似的,而不自觉察自己在一个过渡时代里。假如你问小说是什么,人会告诉你许多个西洋学者的定义,例如‘虚构的人物故

事’、‘散文文学之一种’等等,而且举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几种不同的体制和名目。但这些都是新名词,或旧名词的新用法。小说是个古老的名称,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学本身里也有蜕变和演化,而不尽符合于西洋的或现代的意义。所以小说史的作者到此不无惶惑,一边要想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一边又不能不顾到中国原来的意义和范围,否则又不能观其会通,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这过渡的时代里,不免依违于中西、新旧几个不同的标准,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和看法”(浦江清163)。如此一来,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就缺少中国文学史自身的文学观,乃至历史观,中国文学研究充满了西方理论的教条,而这些教条却是远离中国文学与批评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成了一个不中不西的观念结合。而同样的情形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里也不例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典范。但胡适的中国哲学研究,就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来裁剪中国的思想资料,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构造中国哲学史。正如金岳霖所评价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278)。这种在哲学观念上乃至文化观念上对西方的接受,使得我们对自身传统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究其因在于,中国现代学术参照西方学术而来,现代学术的开拓者们多留学西方,受西方的现代学术训练。西方学术的方法与观念由此移植到中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潜藏的范式,西方潜在地形塑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权力话语。比如,中国的传统治学方法仅乾嘉学派之考据得到重视,乃在于胡适以为其符合美国的实证主义精神,实证主义传统之所以主导中国现代文史研究也在于此。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兴起,西方汉学家以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现代的学术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等也受益于西方汉学。事实上西方理论不仅是汉学家研究中国的理论工具,中国学者本身也在不遗余力地漂洋过海地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试图将其本土化。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对西方理论的大规模使用,于今为剧。回顾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史,现代中国与传统之间存在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一方面是时间的间距所造成的;另一

方面则是由于,百年来中国接受西方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有过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中国对自身的理解无不沾染着西方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其对自身传统的理解已经与西方一样是站在现代性的视野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自我他者化: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他者”,古今从而与中西一样面临着“间距”(écart)或曰间性。^①

三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对自身的传统进行激烈的批判,也始终伴随着误读。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实也是来自于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挫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鲁迅笔下的阿Q,其实与西方人视中国人为“黄祸”的论调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②也就是说,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与歪曲,并不仅仅来自西方人,更多来自中国人自己的一种自卑心理。五四以至于文革,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批判,莫不是与西方人自启蒙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着内在的回应。并不仅仅是西方人在歪曲我们,中国自身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将其视为自身的知识判断而不自知。中国人对传统的理解常常折射着对现实的观照,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社会凋零、人民困苦。五四以来中国人对传统的理解发生了几次逆转,较之于传统,西方更容易被现代中国所理解与接受,根源还在于西方的文化制度乃是中国现代化所极力仿造的对象。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方面抨击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另一方面却极其崇拜西方的器物文明,接受西方对中国传统的批判观点,这种对待西方的矛盾态度至今依然如此。

中国学者对传统的批判思维是接受西方启蒙时期以来所揭橥的现代“理性”的产物,而从根本上这种“理性”就是现代性,其批判的意识更使得他们比较执著于对传统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而较少对自身的西方崇拜有自觉的反省。启蒙通过线性历史观与进步观构建现代性的合法性,现代性就意味着以现代价值来评价与衡量传统,在进步论的视野里传统被视为落后的,是现代必须批判的对象,现代性的价值也是在对传统的批判中建构自身的普遍性。相对于西方的原发性现代性,现代性在其全球化的扩张过程,更伴随着对各

个民族文化的摧毁。西方的现代性在全球的各个民族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民族虚无主义,从而成功地将其树立为普世价值。“从而实际上,在我们东方人要分析我们东方人实际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已经是很困难的了,我们已经很难有独立的思维。也就是说,史学观的形成,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史学观的形成都是从西方过来的,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方式来的社会理想,这直接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当中。这样,我们说我们的意识等于意识,而我们意识也等于无意识,我们的无意识等于无意识,同时我们的无意识也是一种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好像我们是带有意识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无意识。而对于这种无意识,我们又有意识地拿着这个观点去判断一个事物。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赵进中 62)。

中国已经步入现代,但这一现代的进程中“中国”固有的精神已经失落——这就是近来学界所一直讨论的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的失落,何谓“中国”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这说明了古今中国之间的连续性遭受到质疑。^③现代性赋予了中国现代对传统的一种野蛮性,它已经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是内在于现代中国的精神之中,现代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乌托邦内在于中国。现代中国是以西方现代的眼光审视传统,对传统而言,现代中国已经与它互为他者。包华石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历史的了解只是些皮毛,而且他们的逻辑训练不强,结果西方知识分子自卖自夸的宣称,无论有无根据,大都被吸收了。欧美学者偶尔使用诡辩术推广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足为奇。令人吃惊的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乐意地接受他人所断定的思想界限”(“小心西方诡辩束缚中国话语”)。以胡适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即便是在他身上,也体现了对西方的科学主义崇拜,并没有对科学与理性限度进行反思,他着力推动的实证主义方法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上正是对科学主义盲从的体现。自此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仅有文献考据一门值得自豪,但这一方法也因为胡适的实证主义沾染了一种自然科学的色彩,而未能彰显其中的人文精神。正如张祥龙所言,当代中国,传统几

乎所有的价值观念都遭到了质疑,中国人没有形成一种价值的信仰与文化认同,“现在只有一种迷信,就是迷信科学技术,实际上是迷信权利,因为科技之所以被崇拜,就在于它们是第一等的力量”(张祥龙 14)。中国对西方的认同,首先就建立在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崇拜上,西方现代的合法性也就建立在其所携带的科技文明横扫全球。无疑,五四以来对传统的批判其实是学者基于国运低迷,自身内心的痛苦的写照,传统与历史文化承担了寻求对现实困境以合理的解释的任务。正如顾彬指出的,对中国传统的误解从根本而言是现代性的结果。

深刻地认识现代性在中国造成的断裂,是为了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重新吸收传统的价值。对传统理解映照的是现代中国如何理解自身,理解传统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无知与偏见并不仅仅存在于西方人身上,更体现在自身,这才是值得忧虑的。如果一味地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话语批判,而不对自身进行反省,“实际上是在削弱自身的主体性,是故意忽视自身所负有的责任,自身的选择和决定权;是在话语层次上,把自己置于一个弱者和被动者的地位”(田晓菲 13)。虽然对西方的偏见进行严厉的批判有助于化解中国人对自身受到的屈辱的愤怒,却无助于西方进一步真正理解中国、解释中国,激发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的潜能。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要反省自我,才能清理现代中国的局限,才能真正地理解西方的局限。对他者的理解是人们得以和谐相处的根本,中国现代性对传统的责任也在于消除自身的偏见。

四

现代性冲击下的中国,古今之间存在深刻的断裂,造成对自身古典的疏远,这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读解古典的能力已经极大地退化,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存在隔膜,这在古今汉语的差异中已经显露。古今汉语随着现代性的深化,发生了深刻的断裂,现代汉语对古典诗词的翻译与以西方语言翻译古典诗词,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古今汉语的转换并不比中西语言之间的转换更为容易,有时候反而更为困难,^④如今国人少有不依赖现代的解释而能直接理解与阅读古典的。与此

相应的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成西文时,有时竟然就像是两种西文之间的互译,顾彬在谈及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时就指出,以西文翻译古文与现代文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涉及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作品明显受到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影响。所以如果我翻译冯至(1905年—1993年)的话,我也可以说我同时也翻译歌德,同时在翻译里尔克。因为北岛(1949年—)明显受到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里西·洛尔迦的影响,我在翻译北岛诗歌时,好像是在讲西班牙的诗歌翻译成德语似的。因此我翻译现当代中国作家,还比较容易的,能够找到一条德国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李雪涛 52)。^⑤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差异使得两者的翻译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翻译从而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思想的对话。到了现代中国文学,这种思想间的鸿沟就已不是那么显著,虽然顾彬这样的判断似乎略显过度:“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德国文学与中国文学非常接近,区别不太大”(李雪涛 52)。

故此,对于中国思想而言,如今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传统本身枯竭了,而是当代不但丧失了对自身传统的信仰,更丧失了“自觉”和感受力,从而也就缺乏相应的解释能力。对现代的崇信忽视了中国思想所具有的创造力,不能发掘这种创造力是因为当代不能真正地从传统中读出有价值的东西。今天的国人更容易理解和认同西方哲学的概念与体系,因为我们自发蒙起所受之教育就是按照西方现代的思维所构建的,这潜在地已经为我们接受西方哲学的概念与体系奠定了基础。与此对应的,我们与中国古典思想越来越隔膜,现代中国成为传统思想的“他者”。“近百年来汉语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其实已经到了让我们这些说汉语的人‘化’而不甚觉其母语之‘欧’或觉其之‘西’的地步。现在很多以中文写成的理论文字,如果肚子没有对西方理论尤其是对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本身的了解,其实是相当费解的。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已经开始不能在‘自己’的语言中很好地理解我们自己了。当然,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清除语言‘污染’,恢复‘纯洁’。无论如何,我们也已经不可能恢复或回归某种纯粹的‘汉语’看。而且汉语的‘异’(与自己)化过程其实也并非始自近代的欧化或西化。这一过程

可以通过满蒙等非汉语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尤其是元代)而一直上溯到佛经的翻译,甚至更远”(伍晓明 4)。其实,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不同于中西间距来自文化的差异,我们与传统之间的“间距”来自古今的断裂,来自现代性的冲击。传统与我们之间互为现代性的他者,也由于这样他者的“间距”,“‘传统’将会永远成为一个‘他者’而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也就是说,我们以我们对于他者的必然的承认与尊重而让传统继续存在——‘通过’我们而继续向前存在”(江怡 6)。现代性已经深深地植入到我们的生存之中,恰恰是传统慢慢地在我们身上消逝,我们无法回到传统的文化语境,正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真正彻底消化和吸收了我们传统的时候,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也就不再有任何真正的传统了”(伍晓明 5)。

只有认识到自身与传统的断裂,现代中国学术才能理解中国无法以传统的占有者自居。辨明古今的“间距”或曰自身的“他者”性有助于对自身的局限进行反省,从而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理解传统。

五

按照顾彬的解释,由误读对中国的伤害并不来自于西方,更多的来自于中国自身。中国对自身的误读导致的却是自身文化的断裂与冲突,以及对自身文化信仰的迷茫。一个没有核心文化认同的国家如何面对自身的主体性,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问题。在当代的中国学术语境里,我们很难再重新建立中西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因为中国本身面临着深刻的断裂,中国学术本身并不是一个无差异的整体,对于何谓中国,如何阐释中国,并没有一个共识。故此,西方人对中国某些根深蒂固的西方偏见需要我们批判,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是对自身的偏见与无知的反思。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经深刻地镶嵌于当代的世界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已经内化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忽视中西面临着共同现代性,忽视现代性对中国现代知识的塑造,就会忽视中国现代所处的这种混杂现代性处境,忽视中国现代学术的间性特征,对中国学术面临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进路做出错误的判断。

陈寅恪是这样判断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陈寅恪 318)。而之前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早以“学无中西”之说广为流传:“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 131)。正如李零所指出的,“王国维倡言‘学不分古今中外’,当然很有胸襟,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从当时的心理看,实在是无奈。因为,它的背后有很多激烈冲突(今天一样),‘古’与‘今’,‘中’与‘外’,总是陷于二元对立,后者对前者有优越感,前者对后者不服气”(李零 7-8)。总之,“近百年的学术史,是旧学不旧,新学不新,所有学问,不管个人的态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锅粥’,阵脚大乱”(李零 7)。这就凸显出当代中国所处的一种混杂的现代性,故此纯粹的中国学术是不存在的,西方学术思想不但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一部分,中国现代的学术研究必然是在古今中西之间进行定位。“古今中外一锅粥”使得中国现代学术具有一种不纯粹的跨文化性,这对中国而言并不一定是负担,它可以成为一种思想的潜力,即跨文化的潜力,由此中国现代学术合理的定位应该是汉语学术思想,现代汉语本身就是中西古今的一种融合。就汉语哲学而言,其应是关于汉语思想之抽象的、内部的研究,即关于汉语思想本身的理论研究。而这个意义上的汉语哲学,却长期被“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所遮蔽,几乎处于缺席状态。

如果我们相信,语言的界限就是思考的界限,那么用汉语思考的西方理论与思想,一定是融入了西方思想与语言的结果。对西方理论说,当代汉语理论的跨文化正源自这一事实:现代汉语是印欧语言冲击融合的产物,现代汉语是由古今中西的语言滋养的结果,虽然它至今并不令人满意,但这绝不意味着现代汉语不能向着更深刻、更优美的境界发展。当西方哲学通过翻译进入汉语哲学之后,它就被移植到一个陌生的、异己的思想体系中,通过百余年的汉化,它已经在汉语思想中扎根,和汉语本身一道生长变化。现代汉语的成果说明,古今中西的间距孕育着汉语的跨文化性,汉语学术能够从古今中西汲取思想资源,思考中国

现代性的可能性。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理论既是西方原来的理论体系的产物,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是汉语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它已经不同于西方理论的原初思想。在汉语学术的视野里,中国的西方理论研究应该作为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进行重新建构。当代汉语学术的任务就不再是消极地移植西方理论,而是要参与西方理论的变化进程,这会加快人类对思想问题的深刻性。惟其如此,汉语的西方理论才不仅仅是来自异域理论的简单反映,它也是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重构。当代汉语学术具有的跨文化性触及了我们的未思之域,显示了比我们所未开发的潜力,因为现代汉语有着比我们“称之为民族的政治与历史实体更为广泛的现实”(帕斯 353)。

基于这样的学术判断,对中国现代以来的“以西释中”的学术进路,就有必要从古今质变的思想视野里进行理解与评判。仅将中国现代以来的这种援引西方学术理论构建中国学术体系与理论话语的做法视为对中国传统的扭曲,不能客观地评估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意义,不能给予其合理的地位,也会影响我们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因为在这种中西对立的思维范式里,西方学术的意义也并未得到合理的评价。中国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持续地学习西方并与之进行对话,而不是放弃对西方的学习与对话。那些回到纯粹传统的学术的方式在当代并无可能,而以中国传统学术作为尺度来衡量现代学术的做法,其实忽视了中国现代学术本身面临的问题及意义。积极的方面来说,正是西方理论的进入给中国学术带来了活力,才有当代汉语学术具有的跨文化潜力。以中国哲学为例,许多中国学者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的评价过低,将其失败归于以西释中,但事实上中国哲学的欧化是其普世化进程中必须经历的裂变,有其历史所必然的遭遇。^⑥从根本上来说,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传统作为现代的“他者”,二者的“间距”使得所谓的纯粹的中国哲学并不存在,批判冯友兰中国哲学西化倾向的牟宗三、劳思光等本人的中国哲学研究同样也是“以西释中”。区别只是在于所依凭的西方思想资源不同,哲学预设不同。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冯友兰、牟宗三等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以中国古典思想为对象,但其问题意识与学术方法却是现代的,对冯友兰来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

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的处理着种种矛盾,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冯友兰 362)。牟宗三则认为:“从中国哲学里发展出来的新问题——或者是在这个时代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或者是和西方哲学相接触而引发的问题”(牟宗三 211)。这就使得他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是源自现实的思想困境,所要展开的对话参照系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在他们的哲学里,中国概念的西方化与西方的中国化同时并存,其思想呈现着一种杂糅性,这正是现代的汉语哲学最大的特征。这种“非古非今”使得现代视域里的汉语哲学内在的蕴含着古今中西的间性与张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冯、牟等人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哲学思想本身,援引的西方哲学思想进入中国哲学时有无扭曲,都只能理解他们哲学的一个面向。从其作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展开来说,对此的批判应在一个创造性的维度上来进行,即能否从传统中国哲学中开发出对当代问题具有创造性理解的可能性,能否为面对当代的问题提供足够的思想启发。^⑦在此汉语学术的建构过程中它是否完全忠实于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本身并不是唯一的标准,不能因此忽略这种现代建构中所产生的中国学术现代性维度。这种对中国现代哲学的积极态度,有利于发掘汉语学术所孕育的思想的潜力,汉语学术也就能从古今中西汲取思想资源,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可能性。

六

汉语学术所处的中西古今之间性,将中国传统的原初思想与现代的中国学术的区别开来,将其与西方理论一样视为汉语学术跨文化性所蕴含的内在张力,是将中国传统所蕴含着的古典思想视为对现代性进行审理的思想根据。这启发我们要从一个内在于汉语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如何理解传统,以及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性依赖他者而存在,它塑造了他者,对西方现代性而言,中国构成了其最为独特的他者。现代性具有强大的同一性,现代性无法从自身的源头构建其异端的批判力量,现代性无法从自身生发出具有真正批判理论的理论,现代性的同一性以本体论的话

语吞噬着外在的差异，全球化进程中的普遍主义就是其力量的显现。正如朱利安强调的，现代性的审理必须从外在性的思想中获取资源，而对现代性的外在性（extériorité）思想寻找只能回到中国古典思想。按照朱利安的理解，中国传统是唯一能够提供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现代性的“他者”，让我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他者”。中国传统思想为摆脱西方现代性的宰制，展开中国的现代性，提出了可供思考的思想资源。传统的意义也由此而来。传统对现代而言，就不能只是被现代化的对象。传统应与西方现代拉开距离，传统成为现代的“他者”正是要我们与西方现代性拉开距离。传统的当代意义恰恰在于对现代性的反思，而不是被现代性所扭曲。传统为审视现代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而不是以现代来改造传统。虽然我们不能回到传统，但传统的价值能够被现代接受进入到现代生活。对中国而言，破除现代以来的文化偏见，惟此才能够真正打通自身文化的脉络，恰当地理解自己。传统只能以“他者”的方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不断接近的理解目标，而不可能最终将其占有，现代中国哲学要接受传统的异质性。汉语学术的意义不仅仅是要确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作为对传统的文化保持工作而存在，也不能因此否定西方学术对中国的意义，而是要用汉语激活自身的跨文化潜力。汉语学术的张力来自其立足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将自身客观化间距化，而不是特意地凸显中国性，这才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关节点。

注释 [Notes]

① 这是法国汉学家朱利安的术语，本文取其汉语的意思，就是中国文化在古今之间有着断裂，形成了差异，从而构成内在的张力，中西的间距亦是如此。朱利安的此一概念较为复杂，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而在笔者看来，朱利安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辨明中国自身内部的文化间性，对此作者将另文处理。

② 参看张节末、李鹏飞：“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贵州社会科学》8（2011）73-82。

③ 最近围绕何谓“中国”的讨论就彰显出学界对中国文化认同的焦虑。参看葛兆光《宅兹中国》，许宏《何为中国》。

④ 这种困难就表现在如果我们要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古典的意思的时候，有时候竟然需要借助英文来帮助我们清楚地表达出来。中医徐文兵在《“做个中国人，先识字

吧”》（《新周刊》2011年7月号）举例说：“比如说，疾病啥意思，一查，疾者病也，再查病，病者，疾也，他大爷的！谁他妈的也不懂。这就逼着你去研究，这研究有什么好处呢？就要把它翻译成英文该怎么说，这时候你的思维已经跳出汉语的思维了。你就想，它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就像我们翻译“贫穷”，人家说你很穷，不是没钱的意思，啥意思，穷途末路，就是走投无路的意思了，山穷水尽。我们现在说穷人，意思只是没钱，贫和穷，老在一块儿说，就把它闹成了贫的意思了。你翻译‘贫’，可以翻译成英文的 poor，没钱；你翻译‘穷’，走投无路，endless，走到头了，这下你的思维就跳出来了。所以‘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就不会翻译成：我没钱的时候，我还不发现自己的理想；而是说，当我按我的想法去做，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还坚持我的理想。这种理解就比较接近古人了。”

⑤ 在另外的访谈中，顾彬如是说：“如果我们要了解王家新、欧阳江河，可以把所有的中国传统剔除不看，但却需要好好学习西方文学史。而只有少数的诗人才会到中国传统中去，比如翟永明。”参见顾彬：“希望和孔子、老子、庄子见面”，《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6月14日版，记者渠魁，特约撰稿沈杰群。

⑥ 比如，近来发轫于旅美学界陈世骧与高友工的抒情传统说在大陆学界遭遇到了批评，其根本困境就在于中国抒情传统为了彰显中国文论的本体性却不得不借助西方文论，然而这其实是中国文论建构普遍存在的悖论。事实上发生在阐释中国文论特质的论争中，论辩双方的理论资源其实都难免援引西方理论，所谓的中国性其实往往与西方理论联系在一起。叶维廉与王文生对中国诗歌的特性断然不同，“叶维廉与王文生同为在美国学术语境中研究中国诗、中国诗学的华裔学者，对中国诗的审美取向与阐释旨趣不同导致一重诗中‘画境’，一重诗中‘情境’。”（石了英：《如何理解“中国抒情诗”——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阐释旨趣》，《学术论坛》，2015年第8期）但他们所援引的学术资源都难免西方理论。

⑦ 从西方哲学的概念被接受与转化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翻译中所说的“语意倍增”，参看刘毅青：“哲学翻译作为哲学创造——以西方汉学为借镜”，《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2015）：189-200。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W. H. 奥登：“希腊人和我们”，王敖译。《新诗评论》2（2005）：238-64。

[Auden, W. H. . “The Greeks and Us.” Trans. Wang Ao. *New Poetry Review* 2(2005): 238-64.]

陈寅恪：《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Chen, Yinke. *Collected Poems of Chen Yinke*. Eds. Chen

- Meiyan and Chen Liuqiu.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 *Collected Works of Jinming Mansio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Feng, Youlan. *The Preface to Three-Pine Studi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江怡:“如何解读《论语》的‘微言大义’——谈伍晓明《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中国图书评论》4(2007):4-8。
- [Jiang, Yi. “How to Interpret 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 in *Confucian Analects*; Wu Xiaoming's *My Way Is Penetrated by a Single Thread*.” *China Book Review* 4 (2007): 4-8.]
- 金岳霖:《金岳霖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 [Jin, Yuelin. *Selected Academic Works of Jin Yuel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沃尔夫冈·顾彬:“误读的正面意义”,王祖哲译,《文史哲》1(2005):5-12。
- [Kubin, Wolfgang. “The Positive Meaning of Misreading.” Trans. Wang Zuz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1 (2005): 5-12.]
- :“‘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关于东西方相互理解的一个问题”,王祖哲译,《华文文学》3(2006):5-10。
- [——. “Only the Chinese Understands China: A Ques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Trans. Wang Zuzhe.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3 (2006): 5-10.]
-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 [Li, Ling. *Bamboo Slips and Silk Books and Academic Fountainhea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李雪涛:“与顾彬对话翻译与汉学研究”,《中国翻译》2(2014):52-60。
- [Li, Xuetao. “Conversation on Translation and Sinology with Wolfgang Kubi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2 (2014): 52-60.]
- 牟宗三:《中国哲学史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Mou, Zongsan. *Nineteen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奥克塔维奥·帕斯:《太阳石》,赵振江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
- [Paz, Octavio. *Sunstone*. Trans. Zhao Zhenjiang.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包华石:“小心西方诡辩束缚中国话语”,《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2008年3月3日。
- [Powers, Martin. “Mind Western Sophistry to Bind Chinese Discourse.” *Global Times: International Forum Edition* 3 Mar. 2008.]
- 浦江清:《生命无涯:浦江清随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Pu, Jiangqing. *Life Without Limits: Essays of Pu Jiangq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田晓菲:《赭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Tian, Xiaofei. *The Ocher City*.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王国维:《观堂别集》,《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
- [Wang, Guowei. *Collected Works of Guantang.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Guowei*. Vol. 4.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83.]
- 伍晓明:《文本之间——从孔子到鲁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Wu, Xiaoming. *Among the Texts: From Confucius to Lu Xu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 *My Way Is Penetrated by a Single Threa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张祥龙:《德国哲学、德国文化与中国哲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
- [Zhang, Xianglong. *German Philosophy, German Culture and Chinese Philosoph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2.]
- 赵进中:“十九世纪德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人”,《北大最佳讲座》(第二辑),北大在线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59-72。
- [Zhao, Jinzhong. “The Chinese in the Eyes of German Scholars in the 19th Century.” *Best Lectures in Peking University, Second Series*. Ed. Peking University Onlin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59-72.]
- 朱自清:《语文零拾》。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1年。
- [Zhu, Ziqing. *Essay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11.]

(责任编辑:王峰)